

竞争是孕育新兴产业最佳环境

刘晓忠

政府每年出资 2000 亿元在未来五年撬动 10 万亿元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传闻,看来是一场虚惊。近日,发改委高新技术司司长葛成元表示,正在草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以如何完善法律和政策、如何培育市场等为主要内容,并没有上述投资内容。这一公开澄清使人们不再关注投资量,把注意力转向了有关部门提供的减免税收、拓展知识产权融资等一揽子政策的支持力度和方式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 4 万亿刺激计划就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政府办事的决心。然而,在新兴产业振兴这一问题上,仅靠政府产业政策的促进恐怕力有不逮。不论产业扶持政策立意如何善良,都只不过是行政之手引导、或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这就引发如下问题:产业政策规划者的善意能否借助行政之手使经济资源配置达到理想的成效?对特定产业的扶持性政策,是否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不引发错配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人们习惯于以日、韩为例来论证产业

政策之合理性。诚然,日、韩两国实施扶持产业政策确实使其经济受益匪浅,但光环背后则潜伏着重重危机。日、韩等产业政策,尤其是日本主银行体系下的银企紧密型合作模式,培育出了财团巨无霸机构,这些巨无霸财团产生的经济、金融资源聚合效应,使中小企业难以与之抗衡,从而削弱了其竞争活力。产业政策本身对财团集团在经营、研发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无形中变成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束缚,一旦离开产业政策指导,很多企业就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

产业政策的实施,使企业研发和经营活动更多地围绕政府财政活动而展开,而不是市场导向性的。这是一种鼓励精益而标准化的经营理念,这种模式难以培育出新兴产业所需的基础原创性理念和创造性怪才。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本田等财团在一边享受产业政策提供种种支持,一边又抱怨通商产业部事无巨细的指导束缚了企业发展的手脚。例如,日、韩两国的产业政策虽然刺激了汽车业和电子信息业等领域的消化吸收和竞争力,而在存在巨大发展不确定的新兴产业领域,相对于欧美自由市场竞争下的企业,日、韩企业普

遍处于追随者的地位,1990 年代信息产业革命在美国蓬勃发展,而不是发生在日、韩等国,原因就在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技术的商业化需要企业基于市场自利博弈,而非行政指导。

就中国而言,产业政策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如新近的高铁行业就令人喜中生忧。从 2004 年至今,从零起步的中国高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开始上升,这算是中国产业政策下的新近较为成功的案例。然而,中国高铁的竞争劣势,本质上仍是政策支持下的市场优势,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技术竞争优势。中国高铁产业的诸多核心技术依旧要向国外专利拥有者购买,需要支付大量专利费,可见这种竞争力并非真正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创新力。因此,有理由担心一旦日后国际高铁技术实现突破,中国高铁产业能否延续其竞争优势。

另外,高铁技术尚处于商用化培育期,高昂的建造成本削弱了其商业回报。通过政府投资扩建高铁网效益可行性仍面临争议。可见,中国高铁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含量并不高,这种短板也是产业政策所无法弥补的。

再以风能等新能源为例,政策引导确实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较快发展。但目前风能、硅晶体等产业所暴露出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应引发决策层的反思。这些新兴产业在产业初期就面临产能过剩等本属成熟产业所具有的症状,是因

为技术商用化、技术经济效益化没有得到市场验证,却在产业政策之下得到扶持。这种扶持造成了经济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

由此可见,产业政策在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根本缺陷,在于无法提供激励约束的共容机制。在市场机制下,激励约束本身就对立统一,激励中内生有约束效应,约束中孕育着激励因素。如市场对研发的激励,是因为经济效益上有可行性,即资源倾向于配置于某一产业而非其他产业,使投资于这类领域更能实现其自利最大化,换言之经济金融资源向某一领域的流动,是源自于交易者主体自利最大化之约束,同时某些产业无法吸引资源,是因为该产业对资源的激励效应未为市场所接受。

因此,产业政策能否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取决于产业政策是否为市场交易主体提供了自利博弈的自由发展空间。以自由之理念孕育新兴产业的战略机遇,新兴产业才能经受住市场考验,才能在不引发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下,与其他产业公平竞争经济金融资源。同时,也唯有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洗礼,创新的力量才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非特定行业的专利。

焦点评论

有一说一

警惕人才专用房堕落为特权房

王言之

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宣布未来三年建设 150 万平方米“人才专用房”,纳入保障房体系。今年开工的 50 万平方米人才房占用了一半的经适房指标。根据政策,人才专用房可以市场一半的价格购买,被指是高收入者的福利。目前已有杨澜、余华、朱德庸等名人入住。

用一半的经适房指标建设“人才专用房”,而且打五折出售给高收入人才的做法,如果不是因为杭州人民已经人人享有高品质住房,便是政府在为高收入者开特权的后门。杭州人民已经人人拥有住房的假设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到目前为止,杭州房价已经达到均价 2 万/平方米的价格,买不起房者比比皆是。

杭州出此政策的缘由之一为了吸引人才以及奖励突出贡献者。到底能不能真正地吸引到人才暂且不论,反正这些既廉价又高品质的“人才专用房”确实吸引了很多的人才前来入住。如此优惠的条件,怎能吸引不来人?据报道,目前前来入住的不仅有文化名人,如余华、杨澜、朱德庸等,还有一些公司大佬等高收入者: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总经理王奇伟以及中国重汽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销售部总经理王根生、杭州民生药业集团副总经理陈稳竹等人。这些人才的收入哪一个也绝不会沦落到买不起房子的地步。

高收入者反而享有高福利,这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其泛滥之处不仅表现在类似于杭州为高收入的人才提供物美价廉的“专用房”,腾讯老总马化腾领取住房补贴,还表现在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高福利。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已危害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社会安定。

杭州市关于申购“突出贡献人才专用房”的规定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申购人除了须满足一定突出贡献条件之外,还要求申请人目前无房或福利性实物分房建筑面积低于 100 平方米。”这种规定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这些家产万贯的“人才”没有房产并不说明其买不起房,住房面积小不一定说明其需要大面积的住房。所以,这不是政府在满足这些高收入者迫切的生活需求,而只是在向这些高收入群体送礼,或者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为这些人提供特权,其危害实在是很大。首先,花纳税人的钱为高收入者提供高福利有违税收本意,即为纳税人谋福利,而不是为某些人谋福利。而且,杭州市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老百姓比比皆是。不优先考虑市民的迫切生活需求,却拿着市民的权利去“行贿”高收入的“人才”,真可谓头脚倒置。其次,这种为一部分人开特权后门的为违背了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也掩盖不了这种以半价销售、面对高收入人才的“人才专用房”的特权本质。



ICLONG/图

越改越高的税改

财经漫画

经济时评

中国城镇化模式需要大的改良

李浩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战略,已被视为未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的《2010 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到 2015 年将超过 50%,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中国还将有约 2 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用人口来衡量的,但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因素,在城镇化过程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向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村用地向城镇用地转变的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上了深深的“政府”烙印。城镇化的基础是土地,而政府是土地资源的最大获利者。不过这种模式正日益穷途末路。当强拆引发的“人民

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当良田在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的时候,必须慎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向何处去?

除了“政府主导、农民被动”之外,城镇化还有第二条路,即“政府退出、农民自主自发”。但政府充当“旁观者”、完全由农民自主自发推动城市化的办法,虽可解决农民收益问题和城市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但会产生严重城市病,很难持续。因此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即“规划主导、农民主体”。即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组织者、服务者、制度提供者,主动破解二元体制藩篱,对规划、土地、资金、基础设施、社保、人口管理等主动改革,允许集体土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土地市场。

但笔者认为,在财税体制未根本改变之前,未来的城镇化恐怕还是难以改变政

府主导的模式。不过,确实有两个关键环节必须得到改变。

首先是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要有根本性转变。过去,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由政府、开发商和企业“坐庄”的游戏之外,大量不愿进城的农民“被上楼”。他们失去土地后,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的新的过渡性群体,他们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同时,即使已经进了城,也实际上在享受“伪户籍”。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明显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未来不改变,不仅城市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也必然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日积月累的“隐性成本”无法估计。

第二个关键就是城市规划问题,这主

要表现在两大弊端上:一是规划过软,规划内容朝令夕改,一届政府一个规划思路,行政权大于规划权;二是规划的科学性不够,缺乏足够的战略研究,过于“贪大求洋”,盲目“急功冒进”,注重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结构要素、利益群体的均衡协调发展。缺乏科学规划的城镇化带来了诸多弊端:交通问题、城市基础服务不足、城市生活品质下降、环境污染、城市公共安全、建筑物寿命极短等。

总之,城镇化仍将是今后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其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都将重塑。全球城市化已有多种经验教训在前,国内城镇化也积累了多种问题,如果不从利益分配和战略规划方面加以调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难免走上过去问题丛生的老路。

(作者为安邦咨询研究员)

国际观察

美联储 QE3 负面作用为主

陈东海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于周日晚间亮相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 分钟时事杂志》访问节目,解释联储局决定购买 6000 亿美元国债的原因,他对批评指此举将导致通胀之说作出了辩护,并且表示不排除会推出第三波量化宽松措施(QE3),增购国债。

美国第二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是 11 月 3 日推出的。推出 QE2 时正值 G20 集团即将在韩国首尔开会,因此美国的政策遭到一些国家的猛烈抨击。回想在美联储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第一次推行 QE 时,全球虽然有很多人批评其大规模的投放货币的政策,但是主流却是对此认同的,并且随后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管理当局都跟随着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但 QE2 正式公布以后,虽然前后也有一些经济体采取了加码宽松货币政策的,但是多数声音是对此表示质疑的。对于伯南克声明未来不排除实施 QE3,全球不得不对此做出提前预见与对策。

首先,要了解美联储到底会不会推出第三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 11 月初推出 QE2 时,伯南克就宣称未来会根据经济的具体情况,对 6000 亿美元的新增国债购买计划进行适度的调整。在这次以后,美国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中,乐观的数据多于悲观的数据。因此按照美联储当时的会议纪要的精神,未来美联储可能会减少购债规模。但是,12 月 3 日晚间,美国劳工部公布了美国 11 月的就业数据,其中净增非农就业人数仅为 3.9 万人,远远不及预期的净增长 14.0 万人。而 11 月的失业率,也从 9.6% 突然提高至 9.8%,让市场大感意外和失望,此前曾经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9.6% 的水平。因此,以推动就业为目标的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不管其有没有用(美联储相信有用),就必然一直持续到美国就业数据出现持续性的、趋势性的明显好转的状况以后。现在美国的就业数据再次出现急剧恶化的势头,那么美联储实施 QE3(即加码宽松政策的规模)的概率将逐渐增大。由于全球化和美元事实上的国际储备地位, QE3 对于全球各国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各经济体当局需要对于美国的 QE3 未雨绸缪。

其次,对于美国的 QE,到底对于美国有没有作用,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清楚,同时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到底有什么影响,也需要明晰。直观上来说,美联储实施 QE3,就是增加了购买国债的资金,因此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美国国债的价格会上涨,所以国债收益率会下跌。而美国的信贷利率,极大地受到美国国债的影响,所以美国的银行信贷利率必然会受到 QE 的压制。正是因为如此,美联储才寄希望于通过 QE 来压低市场利率,促使美国企业

扩大投资和生产,以及商业活动兴旺等等,进而导致就业增加。但是,从 QE1 到 QE2 的情况来看,在正式计划实施后,美国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都走高,而 6 月期国债收益率只是在 QE1 公布后出现过下降。所以,美联储的第一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同样,促使企业扩大信贷以增强商业活动的目的也没有达到。

而根据美国 10 年期与 6 月期国债收益率的差值来看,美联储的 QE 政策在经济的总体影响上效果也不彰。从该差值的谷底水平,往往可以看到美国经济的周期情况。在该差值达到谷底时,往往就是经济处于最糟糕的时候,其后经济就会转入下坡趋势。而在该差值处于高峰水平时,往往是经济处于最糟糕的时候,其后经济往往好转。但是,在 QE1 以后,这个差值从 2.5% 附近的水平持续攀升,在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4 月之间,稳固在 3.0% - 3.7% 水平。这说明美国的经济在 2009 年下半年以后的复苏是伪复苏。在 2010 年 11 月初美联储推出 QE2 以后,该差值再次出现上升势头,从 2.33% 附近上升到 2.80% 附近,出现重复 QE1 后的情况,表明美国经济再次恶化。因此,在 QE 政策推出后,这个宽松政策实际上只是激发了一些信心指数之类的先行指标的改善,并由此带动实体指标的微弱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实体经济的改善,所以在 QE 政策推出后的经济复苏苗头,都是很脆弱的,实际上是假象。

那么,由于 QE 政策只能起短期的、脆弱的正面作用,其主要作用实际上是负面的。从本质上来说,由中央银行来购买国债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让公共债务转变为一种基础货币,即“债务货币化”。那么,扩大出来的货币,由于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稀缺,所以必然被金融机构拿去吹金融泡沫,让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局面愈发严重。

这种“债务货币化”的东西,对于美国经济除了上述的不良影响以外,对于全球若干部经济体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客观来说,美联储实施 QE 政策,乃是出于解决美国自身的艰难问题而不得已为之,并非出于“阴谋论”者所猜测的那样意在损人,但是由于全球化导致的政策外溢性,那么通过“货币债务化”,必然使得那些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机构,其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份量或威慑力减轻,美国因此可以更多的居于主动地位,所以,海外持有者手中的美国国债的含金量下降。

因此,美联储出于其职能要求,不管其政策是否有效,在美国经济未来前景暗淡的情况下,确实可能继续实施 QE3。而该政策,无疑将增加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政策难度。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稿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 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 ppll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 5015 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